

“轴心时代”别解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俞吾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希腊、印度和中国分别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各自为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制定了思想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氏把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称为“轴心时代”。所谓“轴心”，即其他历史阶段围绕其旋转的中心。正如雅氏指出的：“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雅氏的“轴心时代”理论在国际史学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在华语史学界也成为叙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的权威性用语。人们还在雅氏所使用的“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出“前轴心时代”、“后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时代”等概念。

然而，只要冷静下来思考，就会发现，“轴心时代”理论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理论。首先，这一理论缺乏普适性，它只是采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概括了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中出现的现象，但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如古代埃及文化、古代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等。难道它们的思想范式也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这个时段内形成起来的吗？其次，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纪年法。如中国人把每60年称作一个“甲子”，西方人把每100年称作一个“世纪”，印度人则倾向于把时间理解为一个首尾相衔接的“圆环”。而雅氏所说的“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属于西方文化系统的纪年法，为什么这种纪年法计量的时段会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呢？再次，虽然不同类型的文化发展的进程充满了曲折，但总是沿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向前发展的，而不是按照天文学中的“地心说”的模式来运行的，因而也不可能围绕“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制定的思想范式来旋转。其实，雅氏的“轴心时代”理论，与季羨林先生的“河东/河西”理论一样，是一种无根漫谈，既缺乏理论上的严格性，又缺乏实践上的普适性，不值得认真对待。

然而，如果对“轴心时代”概念作出不同于雅氏的阐释，这个概念在史学和哲学研究中仍然是有意义的。按照我的看法，真正的“轴心时代”乃是“当代”。所谓“当代”，也就是指从今天回溯到六七十年前这个时段，约略相当于一代人的平均生命周期。为什么真正的“轴心时代”应该是当代呢？假如把极少数以前时代出生的、长寿的老人撇开，完全可以说，在历史上唯一活着的群体就是当代人。尽管当代人是在传统思想文化范式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但其思考的出发点却始终是自己面对的现实生活。正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他们以何种态度(或无条件地认同，或有条件地保留，或批判性地反思，或彻底地抛弃等等)去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范式，而不是像雅氏所说的，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形成的思想文化范式决定着当代中国人如何生存。既然历史的意义只有通过活着的当代人才能得到阐释，所以唯有当代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轴心时代。

事实上，人们对以前任何时代的阐释，都是围绕着当代人生存活动中面临的实际需要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具有类似的含义。中国人所说的“六经注我”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这里的“我”乃是当代人之别称，而“六经”则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范式的代名词。既然只有当代人是活着的，轴心自然永远是“我”，而不可能是“六经”。

当然，我们所说的“轴心时代”并不像雅氏所说的，是一个固定的、永不变化的时段，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向前延伸的。假如说，目前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作为当代，相对于历史上以前的其他时段来说，是轴心时代，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湮没在历史的黑洞中，而取代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时代又将成为新的轴心时代。总之，除了轴心时代永远是当代这一点不变外，轴心时代本身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中。

当我们从雅氏的“轴心时代”理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站在新的起点上来重新认识历史时，我们发现，历史的意义不是由某些古代的人物或文本来决定的，而是由活着的当代人通过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来加以确定的。